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三十八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合订本 第三十八册

(总一〇一—一二二)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长赋 沈美娟
方正 丁小梅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38册）

（总110—112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89年12月第一版·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0.75 字数：533千字

印数：1—32000册

ISBN7-5034-0009-9/K·10

定价：8.00元

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总110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 忆 旧 谈 往 ·

纪念蔡元培先生.....梁漱溟 (1)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纪念梁任公先生.....梁漱溟 (9)

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写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之后

回忆李大钊先生.....梁漱溟 (16)

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司徒丙鹤 (20)

何香凝为美老撰写的墓志

漫长曲折的道路

上书毛泽东的经过

秘密经过台湾海峡北上

政协会议期间的北京饭店

侨领两老的会见

瀛台之宴

国号之议

开国大典

陈毅将军谈“上海之战”

紫禁城下六年

到广东侨乡视察土改

漫游祖国名胜
几项重大的政见
介寿堂的寿宴
隆重的葬礼
结束语

记中纺公司迎接解放的经过……………孙越崎（51）

· 政坛琐记 ·

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扩大会议始末……………田象奎（54）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的内幕见闻……………马建中（62）

败絮临风的前奏曲
瘫痪没落的国民党中枢
会场内外见闻

蒋介石派我回西康的前后……………张练庵（70）

面授机宜
近忧远虑
打入西康
稳定局势
审时度势
密谋起义
巧度难关
起义经过

· 特务内幕 ·

中统与我……………孟真（98）

陈昶新在军统……………毕骥（113）

前言

张学良将军的亲信
为什么参加军统
“放牛图计划”成泡影
重建东北集团实力的落空
寄托于民主的妄想
一张不生效的释放令

在镇压“春荒暴动”的掩盖下……………刘崇朴 (137)

事件真相

绑架

戴笠飞蓉

血腥镇压

· 洋 行 幕 后 ·

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丁福成(147)

- 一、南京礼和洋行成立
- 二、礼和洋行的地位和背景
- 三、德国顾问和礼和洋行的关系
- 四、经售军用物资及所得利润
- 五、怎样向国民党政府兜售生意
- 六、在竞争中施展手段
- 七、欺骗敲诈
- 八、贵重武器竟遭弃置
- 九、日寇占领南京
- 十、抗战胜利以后

· 海 军 史 话 ·

海军生活见闻……………周应聪述 李蓬洲记 (168)

- 一、我的童年
- 二、烟台海校生活
- 三、在南京海校学习
- 四、上舰实习
- 五、在海军租船处
- 六、迎接北伐军
- 七、在血雨腥风之中
- 八、赴英国学习海军
- 九、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学习
- 十、任教练员期间
- 十一、随特使代表团出国
- 十二、“八·一三”以后

烟台海军学校……………魏应麟 (197)

创始的情况

学校教育的情况

张宗昌勒令解散烟台海校

· 资 料 ·

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学衡派”文学

论争大事记……………孙玉蓉 王爱英(204)

· 忆旧谈往 ·

编者按：梁漱溟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是我国著名学、哲学家、爱国民主人士。这里刊出的是他忆旧谈往的三篇文章。其中《纪念蔡元培先生》写于一九四二年，一九七〇年、一九八四年又四次写下了附记；《纪念梁任公先生》写于一九四三年，一九七六年又写了后记；《回忆李大钊先生》写于一九七九年。耄耋老人追念其相与相知 的历史名流，自有其独到之处，弥足珍视。

纪念蔡元培先生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梁 漱 溟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愚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愚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事物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

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清室复辟运动，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体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

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究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藉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馀、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俱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的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诸位先生。我只

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灵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于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求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

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鎔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鎔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留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难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八九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年，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等，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二十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日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们

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具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有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安排的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来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十二及十三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风气不同，然亦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

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行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庵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乃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些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气，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亦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寝寝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一九七〇年忽于乱纸堆中发见吾手稿原迹，计经二十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一九二七），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任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诎不在此耶？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些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气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十一月八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二十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

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漱溪识

我以民国六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民国十三年辞离北大，计首尾七年。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科系，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麀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垕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再识